

开卷丛书

狐撞钟

明清文言小说卷

杜维沫 编著

有与狐为友者，
天狐也，
有大神术，
能摄此人于千万里外。



陝



版社

开卷丛书

狐撞钟

明清文言小说卷

杜维沫 编著

有与狐为友者，
天狐也，
有大神术，
能摄此人于千万里外。

(陕)新登字 004 号

· 开卷丛书 ·

狐 撞 钟

——明清文言小说卷

杜维沫 编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5.75 印张 4 插页 136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11,000

ISBN 7-5419-6575-8/I·311

定 价: 9.10 元

责任编辑 王志章

封面设计 徐未未

内文设计 姚雪琴

· 开卷丛书 · 编委会

主 编	杨匡汉	赵喜民	
副主编	汤学智	陈绪万	张德祥
编 委	赵喜民	杨匡汉	汤学智
	陈绪万	张德祥	傅美琳
	赵常安	鲁小红	田和平
	王志章	沈 斌	姚雪琴
	高光起	卢兴基	李 易
	蒋守谦	孟繁林	王保生
	贺学君	董之林	刘 纳
	吴岳添	班 澜	邓晓丽

面对绵延的高山巨灵

杨匡汉 汤学智

人生需要两种空间——物质的空间和精神的空间。作为文明之花的文学，为人类生存提供着广阔的精神空间。

人的生命如逝水，一去而不复返。惟文学与艺术，往往可以追回人们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或进入另一种足资向往的可能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当你工余饭后，案前林下，一卷在手，古往今来，神游物外，可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生命，抚慰心灵。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如良师耳提面命，有如友朋品茗夜话，有如情侣倾诉衷肠，亦有如听风听雨过清明……故古人有“开卷有益，不以为劳”之说。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企望视野的开放和精神的拓展，那就应该对文学，尤其是本民族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和体认，从而进至文明度更高的精神生活之中。

当你开卷时，你所面对的文学世界，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和浩瀚的。

从本质论角度看，文学是人学，也是心学。它是人的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歌唱，是人的情感和智慧孕化的产物，是人的具有无限创造潜能的本质的自由显现。文学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内在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文学；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而且，只要人类还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文学之花也一定会愈开愈鲜艳。在文学内涵中，最深

刻的便是它所体现的人的内在精神的普遍性底蕴；同时，由于任何人群、任何民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成、发展和演化的，并由此铸造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个性，故而文学又自然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风貌和文学精神。

从本体论角度看，文学是承载生命信息的语言建构。在长期的文学积淀中，形成了由各种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文本构成的文体系统。以文体类型而论，文学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类型构成；以审美需求而论，有俗文学与雅文学之别；以创作流程而论，又有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分。所谓民间文学，是指大多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民众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的形式，在人民大众中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所谓通俗文学，是指用通俗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大众所喜爱的生活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都流传于都市市民中间，也可称为市民文学。所谓雅文学，是指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层次与功能不同的各种文学共生互补，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学的百花园。每一种具体文学样式，每一部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的灵魂与血肉。正是这些众多的“生命”，建构起文学的生命系统。

从发展论角度看，在历时方向上，文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共时形态上，它又包含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学。同时，它还是一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的文学，人类正在不断地把自己从现实发展中展示出来的新质注入其里。因此，我们看待文学，必须站在本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创造所积成的巨大精神财富上，既不能割断古今，也不可划地为牢，应对文学的传统予以充分的尊重，对文学的创新持宽容的器度。

《开卷》作为普及性的大型文学丛书，旨在重点介绍和阐释中华民族文学、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有助于读者阅读，有必要对中国文学的常识，作一些说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有 5000 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汉民族文学始终居于主导的和中心的地位。早在文字发明以前，汉民族的文学就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在人民口头诞生并流传了。像“女娲神话”、“羿神话”、“大禹传说”等等。这些独具特色、有永久魅力的上古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

中国文学的发展，一般按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上起先秦时期的西周，下至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 3000 余年。

诗歌是产生最早、发展最充分、成就也最为辉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有“诗歌大国”之称，古代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前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者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气势磅礴，想象奇特。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进入黄金时代，诗人辈出，诗篇累累，形成了以律诗为标志的近体诗。宋元之间，同诗有着密切联系两种文体“词”和“散曲”，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分别成为宋、元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志，故有“宋词”、“元曲”之说。词和曲是诗与音乐结合的产物。它们比律诗更为自由、灵活，利于传情达意。

古代文学中产生较早的还有散文。散文的源头可推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庄子》等诸子散文。古代散文的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中的诸子散文；二是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涌现了“唐宋八大家”；三是明清时期，诸如“竟陵”、“桐城”等流派的散文，

均异彩纷呈。

古代小说出现和发展较晚，这同它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邪宗”有关。小说虽萌芽于汉魏六朝，唐（传奇）宋（话本）时期均有长足进步，但比较繁荣发展的局面直到明清两代才出现。这是那时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明代主要是“拟话本”和通俗体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描写日常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小说《金瓶梅》。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已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转向描写现实社会的寻常生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领域。清代的《红楼梦》便在这一艺术方向上，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高峰。此外像《儒林外史》等等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虽同“志怪”、“传奇”一脉，但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中，包含着对自由幸福和光明的追求，成为文言小说的翘楚。

古代戏曲的开端是元人杂剧。杂剧包括“唱”、“念”、“做”等多种戏剧样式，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综合体。它最初以北京（大都）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很快传遍全国。元、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华古国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开始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史称近代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近代文学。

这一时期，政治上、军事上失败的现实，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国体的腐朽、文化的落后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文学上有着明显的反映，最突出的是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在这种主张影响下，出现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和《孽海花》（曾朴）等一批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为主的“谴责小说”。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作家、诗人。自此以后，就其主流来看，文学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社会和文学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多变，这给文学以直接的影响。“五四”前后，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随着自身的日益觉醒，要求文学更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斗争生活，并且在形式和语言上进一步要求通俗化、大众化。30年代后期开始了抗战文学时期，其中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以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上海的“孤岛”文学，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抗争文学。现代文学时期尽管只有短短30年，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使它彻底完成了文学采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内容上的深刻转变，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积极的革新和发展，开拓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从而使中国文学开始同世界文坛声息相通。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艾青、曹禺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40余年，在大陆，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颂歌文学”为主潮。到文化大革命，整

个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的惨痛事实，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反省，这就促成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到80年代，反思由社会角度进入人的层次，继而又深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遂有“寻根文学”之问世。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青年作家现代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倾向的探索。从历史眼光看，“文革”以后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突破性的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是新中国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包括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文学。台港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异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发展，有其明显的殊相，但同根同宗同文，其人文精神和语言风貌，却与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相通。台港地区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理应纳入“开卷”者们的视野。

中国文学又具有多民族性。除汉族外，尚有55个兄弟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民族，如藏、蒙、维吾尔、哈萨克、纳西、彝、满、柯尔克孜等族，都有自己的文学，这些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有不少优秀的民族作家。有些民族还出现了能以汉文写作的著名作家，如杂剧作家李直夫（满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杨讷（蒙古族），词人纳兰性德（满族），作家尹湛纳希（蒙古族）等。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除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外，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有如璀璨的明珠，与汉民族文学互相辉映，把中国文学的花苑装点得绚丽多姿。

中国文学历经了如此漫长的旅途。这片故园神州，是它丰腴的精神沃土，一代接一代地生长出文学之树、艺术之果。这世代相续、不断繁荣的文学艺术，恰似绵延的高峻山岳的巨灵，震撼着也温暖着人心与人生。我们为之自豪的还在于，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精神历来互相交流和影响，从而为文学的民族融合、艺术发展不断开辟着道路。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始终是鲜明的、无可替代的。这也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人文精神有其极为丰富的包容性，体现出举世公认的博大深远的气象。

基于上述的认知，《开卷》丛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深入浅出的叙述，系统而又简要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华民族文学的基本脉络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之精萃，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达此目的，丛书诸卷取以“文”为主、“文”“史”结合的编著体例，既侧重精选作品和文本导读，同时对所涉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品类的概貌、特征、价值等进行史的分析。全套丛书共24卷，其中包括外国散文、小说、戏剧各一卷，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编著者均为在各自学术领域里耕耘多年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然难以呈示伟大祖国无比丰富与恢宏的文学景观。但愿它作为广大读者的人生伴侣，携您共同步入辉煌的文学殿堂。

1993年夏 北京

前 言

杜维沫

在我国小说史上，唐代传奇继承和发展了史传文学及六朝志人志怪小说的艺术经验，取得了极其光辉的艺术成就。由于这些传奇小说的作者能手辈出，作品的内容亦丰富多彩，从而形成了文言小说发展的一大高潮。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属于文言小说范畴的传奇、笔记仍产生不少，但它们的内容多侧重教训和劝戒，艺术上缺乏文采及独创性，故成就不高，较好的也只有明显因袭唐传奇《莺莺传》的《娇红传》等少数作品。进入明代以后，文言小说的能手又复纷起，创作乃重新兴盛，而标志着这一兴盛局面之开始的，是瞿佑《剪灯新话》的问世。

《剪灯新话》有作者写于洪武十一年序，初刊约在洪武十四年^①。李昌祺仿效《剪灯新话》创作的《剪灯馀话》，有永乐十八年自序，初刊也当在其后不久。两书各收传奇小说 21 篇，这些小说的内容虽然大都为烟粉、灵怪、幽冥果报一类故事，而其中却不乏对于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热情讴歌和对于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的有力批判。在艺术上，两书的共同之点是取法唐传奇的写作技巧面又有新的开拓。例如故事情节更为曲折跌荡，人物描绘

^① 见台湾学者陈益源著《〈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90 年出版。

更为委婉细腻，结构布局更为绵密巧妙，以及加强环境铺排，较多插用诗词韵语等。固然，作者为炫耀自己的才华，在小说中插入过多的诗词韵语，有时脱离了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显得累赘，是两书毋庸讳言的一个共同的弊病。但两书中有些小说所插用的诗词韵语确实也相当成功，这些诗词韵语与散文部分紧紧配合，使抒情与叙事相得益彰，因而大大提高了小说总体的艺术表现力。两书作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对后世的文言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不容一概抹煞的。

明初文网极严，瞿佑即曾因作诗得罪而被流放，正统派诗文作家为避害远祸，多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剪灯新话》、《剪灯馀话》于此一时期相继问世，以奇异的故事和华美的文辞打破了文坛的沉闷，令人耳目一新，所以它们都很快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传播十分广远。但它们所包含的进步思想内容，同时也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明英宗实录》正统七年（1442）三月所载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的奏疏这样写道：“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金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当时封建朝廷礼部认为李时勉所奏“切理可行”，英宗皇帝亦“是其议”，于是即下令禁毁《剪灯新话》等书。然而，出乎封建统治者意料之外的是，此项禁令却收效甚微。据袁行需、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著录，《剪灯新话》和《剪灯馀话》现皆存有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刻本，而日本内阁文库现藏有成化二十三年（1487）刻本《剪灯馀话》，北京图书馆现藏有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刻本《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和

《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灯馀话大全》以及两书的其它明刻本，由此可知，至迟自成化初年起，亦即在封建朝廷下达禁令后的二十多年，《剪灯新话》和《剪灯馀话》等书便又得以公开而广泛地印行了。再者，明代中后期书商编印的各种通俗类书，大都选录有《剪灯新话》等书中的作品，事实上，《剪灯新话》等书中的传奇故事在明代中后期可说是家喻户晓的。对此，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中国小说史略》）《剪灯新话》、《剪灯馀话》中的许多篇作品在明清两代还被多位白话小说家及戏曲家改编为拟话本和戏曲，另外，《剪灯新话》原书在明代初期至中期并已传入朝鲜、越南、日本诸国，而且当时在朝鲜、越南均有仿作出现，足见其影响之大^①

明代嘉靖前后，社会经济繁荣，文网进一步放宽，知识界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文化思潮，这是白话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文言小说创作又一个兴盛期的重要阶段，包括邵景詹《兔灯因话》专集和蔡羽《辽阳海神传》等单篇在内的许多优秀文言小说作品都在这一时期产生。此种情势对于清代言言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无疑起了极好的推动作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清康熙二十二年，张潮辑成《虞初新志》一书，收明末清初多位作家的文言小说 150 余篇，嘉庆七年，郑澍若又辑成《虞初续志》一书，收清代初期和中期多位作家的文言小说 87 篇，这些小说主要为史传体，其写法是于真人真事基础上加以增饰，即属于鲁迅先生所说的“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

① 朝鲜有金时习之仿作《金瓶新话》，越南有阮屿之仿作《传奇漫录》。

狗虫蚁作传”之类。因这些小说多出自名家之手，故佳作如林，蔚为大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为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书的《聊斋志异》恰在清初出现，不是偶然的。

很明显，明清文言小说创作的兴盛，形成了我国小说史上在唐传奇之后文言小说发展的又一大高潮，而居于这一高潮之最高点的，则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全稿的绝大部分完成于康熙前期，此后不断增补修改，作者生前有多种抄本流传，却未能付刻，今所见的最早刻本是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继承史传文学、志怪志人小说以及传奇小说的传统写作方法而又加以变化、提高，锻炼成为一种新的文体，从而生动地刻画出气象万千的花妖狐魅、神鬼灵怪的艺术世界，通过这一艺术世界，他多方面地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胸中的愤懑不平，同时也热烈赞颂了许多美好的道德情操，用来寄托他的人生理想。由于蒲松龄勤于搜集民间的优美素材，而他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又不同凡响，所以《聊斋志异》全书近五百篇作品的艺术意境俊彩纷呈，那些闪烁着进步思想火花的篇章，具有永恒的魅力，能够使我们赏心悦目，常读常新。这正如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所评论的：“《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茅白苇，令人一览面尽。”

对于《聊斋志异》艺术描写所表现的新文体和新风格，《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昀却持否定态度。纪昀认为，蒲松龄混淆了小说与传记两种文体的界限，《聊斋志异》只是“才于之笔”，而非“著书者之笔”，又认为小说只可“述见闻”，而不可进行艺术

虚构，他说：“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蝶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盛时彦跋）这种文艺观点当然是保守和落后的。不过，因为纪昀学识渊博，胸襟旷达，文笔又简洁生动，他效法六朝志怪小说创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二十四卷，常常借谈狐说鬼而夹叙夹议，讥刺时弊，鞭挞愚顽，妙语连珠，格调高雅，具有浓厚的艺术趣味，故而全书于乾隆末年陆续出版后即能与《聊斋志异》平分秋色，同样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和纪昀生活在同一时期而年岁稍长的诗人、诗论家袁枚，不以小说显名，他的笔记小说集《子不语》（又名《新齐谐》）三十四卷，也效法六朝志怪，且成书时间也在乾隆末年。其艺术成就虽不及《阅微草堂笔记》，但笔致清新自然，不尚雕琢，讽时之作，亦多有可观。

从乾隆晚期至清末，出现了不少文言小说专集，这些文言小说专集大致即可归为仿效《聊斋志异》与仿效《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两种类型。第二种类型的专集，因作者们多不具备袁枚、纪昀的才思笔力，故罕见佳作。第一种类型的专集，因作者们多致力于用委婉细腻的笔墨叙写故事、塑造人物，故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清代中后期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风貌。这第一种类型小说专集里艺术水平较高者，当推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以及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清末《聊斋志异》之仿作时说：“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